

本期新论目录

学术评价在操作中面临诸多难题

大数据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发展

借力网络新媒体传播哲学社会科学

让科研人员专心做研究——我国科研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

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科学发展

学术评价在操作中面临诸多难题

朱苏力等

给学术评价定标准是一件难事。因为学术评价实际上就是要对学术成果及其所有者进行价值判断。学术评价的实质性标准只有一个，即看研究成果有无学术创新，或曰原创。但是，怎样认定学术研究中的创新或原创，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近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 110 周年系列院庆活动之“首届全国法学研究高端论坛”上，国内多所院校的知名学者就学术评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其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苏力）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王先林教授的发言颇具代表性。

苏力：法学院校如何激励科研

与绝大多数工科或文科的编撰性研究不同，而与理科有点相似，在法学上，学术创造主要是个体，虽不必定是单枪匹马，但个人的创造性是首要的。法学院鼓励学术创造必须关注人才，以发挥个体的才能为中心。

相应的学术管理制度必须围绕这一点。一些最低限的量化管理可能无法避免。首先，因为一些人当了教授之后，就没有多少进取心了，就不太想做研究，不大发表学术成果了。人是有惰性的，包括孔子都“述而不作”，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适度的量化管理可以是一个督促。

但量化管理会有副作用，因此一定要把握好分寸，管理和奖励科研都要适度，否则就会出问题。弄不好，科研发表的数量上去了，但质量上不去，甚至下降，只是统计数据上光鲜。而且要注意，科研水平并不是按学校的平均水平算的，而是按一个院校的最高水平评判的。这就要求院校在科研管理上，要尽可能避免所采取的措施拉低了最高水平。

在我看来，为鼓励真正的科研成果发表，法学院可能采取的措施不多。除了不得不有的量化管理外，几乎是无为而治，就是别让好的研究者感到压力，穷于应对一些不真正有利于科研创造的事，诸如大量填表、申请评奖这类事。

无为而治，学院却可以甚至应当“为无为”。

首先是要关注“进人”，要关注年轻应聘者有无强烈的学术偏好，有没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和禀赋。在我看来这是科研发表的关键，因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而且对于真喜欢学术的人，安安静静搞自己的学术就是一种收益，就不大会去折腾，不在意当个中心主任什么的“官”。

其次，应当注意创造一个单位的学术氛围，就是让大家会想问题，会讨论问题，各人的知识结构不相同但可以互补，互相激发想象力和表达欲望，甚至相互“抬杠”。这种氛围会激发科研写作和发表，有助于改善学术单位的生态环境，对新人也是一种学术塑造。

第三，学院要耐得住寂寞，少搞甚至不搞评奖，尽可能让广义的长时段的市场来评价筛选科研成果。尽管今天所有的发表都称为科研成果，但这些成果究竟有多大意义其实很难说，真正重要的成果究竟会在哪里出现，也很难预测，甚至有了这种成果，也不一定能获得一致认同。因此，对优秀学术成果的评判必须坚持时间标准，即通过长时段来看哪些研究经受了考验，仍然为人们接受和赞赏。

仲伟民：学术的判断是一种纯学术行为

给学术评价定标准是一件难事。为什么？因为学术评价实际上就是要对学术成果及其所有者进行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应该是一种纯学术行为，但实际上会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涉及资源及利益分配时，就会使这种评判极为困难。尽管很难，我们仍要试图给学术评价这种价值判断一个标准。我认为，学术评价的实质性标准只有一个，即看研究成果有无学术创新，或者原创。但是，怎样认定学术研究中的创新或原创，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做出这个判断尤其困难。

为了对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做法，或者说有三个技术路径：代表作制度，权威认定与同行评议，学术评奖。

在学术评价中实施代表作制度的本质和目的，是鼓励学者潜心研究，不为眼前利益所驱，不必追求数量，从容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个举措看似简单，但应该是实际有效的手段，不仅有助于克服目前学术评价中过分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现象，而且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学术研究的水准。

无论在何种学术体制之下，权威认定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定中最为常用，也最为有效的办法。具体表现在：学术期刊的匿名审稿，硕博论文的匿名评审，职称评定的跨院校评审，等等，在本质上都是权威认定。当然，学术权威认定更确切的表述，应当是同行评议制度。代表作制度得以推行的前提是同行评议制度的实行。同行评议是国际学术界的惯例，但这个惯例在引入我国后却大打折扣。在我国特殊的国情环境下，要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必须做到以下两点：其一，学术评价中的去行政化；其二，学术评价中的去人情化。

在欧美学术界，很多著名学者是因为获得了该领域重要奖项而成为领袖人物。但有一点很清楚，这些奖项大多是民间（学会或图书出版机构）举办的，此与中国迥然不同。目前中国有三类奖项：一是官方评奖，二是半官方、半民间，三是纯民间奖项。比较而言，第一

类奖项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这是典型的官本位国家才有的现象,结果很难客观和公正。我们希望民间奖项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这样才能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王先林:形式评价与实质评价相结合

学术评价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许多难题。首先是实质评价与现实效率之间的矛盾。理想中的学术评价当然是像古代那样,通过口耳相传、通过漫漫的历史长河进行筛选,但是这种同行的实质性评价所需时间太过漫长,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发展的需要。其次是数量评价与质量评价之间的矛盾。进行学术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高水平学术成果的产生,但盲目追求数量又会造成学术垃圾的产生。再次是形式评价中还存在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矛盾。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多数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基础性的学术研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但形式评价必然有时间上的要求。这种要求则一定程度上会与学术长期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冲突。最后是学术评价考虑范围的大小也存在矛盾。考虑范围过大会使得学术评价活动失去意义,而评价的范围过小则又会影响学术多样性的发展。

实际上,无论是形式评价还是实质评价都各有其利弊。形式评价不可避免,而且也确实有其积极的地方。一方面,形式评价可有效地制约“学术懒人”,避免形成逆向淘汰机制,实现学术评价的可预测性和形式公平;另一方面,由于精细地实行刊物的分级、被引率的导入,其与实质性学术评价的差距也在不断地缩小,还使得学术界的规范化程度得到提高。但是,形式评价的消极面也客观存在。一方面,过分重视形式评价容易导致学术肤浅甚至学术造假的问题;另一方面,学术形式评价可能助长学术行政化的趋势,导致学术独立性受到影响,新的学术力量也受到抑制。实质评价虽然“看上去很美”,但是也有其消极面,尤其是面临着操作上的现实困难,甚至被人为操纵而影响学术评价的客观和公正。而且,法学作为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对其进行形式评价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还有利于刺激法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促进本身就具有一定保守性的法学保持一种学术开放性。

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术评价宜采取以下原则:形式评价与实质评价结合,以形式评价为主;数量与质量并重,更重视质量考核;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逐步延长学术成果评价的时间;实行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的成果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

《社会科学报》2014年03期

大数据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发展

孙建军

当前,科学数据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数据密集型知识发现方法受到科学界的普遍关注:科学家不仅通过对大量数据实时、动态地监测与分析来解决科学问题,更基于数据来思考、设计和实施科学研究。数据不仅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且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人们不仅关心数据建模、描述、组织、保存、访问、分析、复用和建立科学数据基础设施,

更关心如何利用泛在网络及其内在的交互性、开放性，利用海量数据的可知识对象化、可计算化，构造基于数据的、开放协同的研究与创新模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人文计算”、复杂网络分析、大规模数据分析为特征的研究方法逐渐被采纳，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显著增强，而批判性与人文关怀有所弱化，学界对此褒贬不一。

人文社会科等研究的数据挑战

其一，科研资料总量的快速增加给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带来了巨大挑战。2006年，Gregory Crane 提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自身研究领域都面临大量文献资料的处理，这些文献资料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阅读能力所能处理的范畴，因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将不得不借助计算机来处理完成相关文献资料，即“百万图书的挑战”(Million Books Challenge)问题。随着跨学科研究趋势的日益增强，传统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计算机处理模式和分析方法，各类依托计算机存储媒介数字学术资源的开发，基于复杂运算和分析的计算机模拟与实证，基于事实与证据的商业预测与案件证据推理等研究议题广泛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文知识的获取、标注、比较、取样、阐释与表现方式。尤其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艺学、民族学等多个人文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并组建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形成了国际数字人文机构联盟和数字人文中心网络两大数字人文研究联盟。

其二，资料的数字化改变了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料类型，数字资源的采集、加工和处理对研究成果的获得作用日益显著。目前，海量的图书、报纸、期刊、照片、绘本、乐曲、视频等人文资料被数字化，并在互联网上被提供给研究者存取利用。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资源相对于数字文本、数字文献等数字信息资源，来源更加广泛，数据粒度更小，记录单元更加碎片化，结构更加多元化，机器生成数据也显著多于人工生成数据，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对资料的汇集、保存和综合利用更加依赖计算机的辅助，人文社会科学也越来越需要依赖计算机对研究过程的支撑，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计算机技术和分析技巧的缺失甚至可能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实现，进而将计算机分析处理能力延伸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科研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数据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思维

从当前数字人文和人文大数据研究情况看，人文及社会计算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融合出现了三类新的研究思维：

其一，人文社会科学开放与全过程研究思维。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为最终成果，再利用主要以文献引用、转述和评论等为主。而数字人文研究可记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完整过程，资源化的原始数据、中间成果得以立体化应用，再利用水平显著提升。目前，国外以在线实验室、项目网站、开放数据集、项目论坛、项目社会网络为特征的立体开放研究思维普遍确立，可参与性大大增强。

其二，人文社会科学碎片化重组研究思维。大数据环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加注重片段数据、海量数据、非结构化数据的采集、清洗与分析，通过碎片化重组，深度揭示难

以处理或无法预知的科学问题。比如通过海量自然语言表达效果观测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通过科学家的在线时间与资源下载时间分布研究科学家的作息时间与工作强度等。

其三，人文社会科学计算分析研究思维。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也主张采用是非论断，采纳或拒绝某一特定假设，是采用确定性、因果关系的研究思维。在大数据环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采用计算分析思维，对相关命题进行趋势分析。

此外，在上述研究思维体系下，跨学科协作、跨平台协作、海量资料加工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计算化趋势日益明显，并涌现出若干研究取向与热点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大数据研究的基本特征

综合已有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数据研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所涉及资料均大大超过一般的阅读、分析和理解所能处理的范畴，是以往“不可研究”或“难以研究”的，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出现提供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的研究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

二是引入计算分析方法，其结论并非观察、思索、领悟等传统方法获得，而是通过大量数据的汇集而“自动涌现”，其理论的获得不同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三是均构建了可持续完善和丰富的数据集和分析工具，其可用性、共享性、重用性、协作性大大增强，提供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规模协作的可能。

四是均具有跨学科特征。数字人文研究需要汇集专业领域技能、数据管理技能、数据分析技能和项目协作技能，因而这类项目往往由跨度较大的不同学科的专业学者共同完成。

五是决定研究质量的主要是数据集的质量、数量和利用方式，而研究假设相对容易。在某程度上，数据科学家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大数据研究中的主角。

人文社会科学大数据研究的隐忧

虽然以微软、谷歌、IBM 为代表的主流数据服务商都极力推崇数字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好前景，但其也存在不足：

首先，非场景化的研究逻辑缺乏适用性与人文关怀。由于完全剥离了数据所处的具体环境，数据可能生涩，并且缺乏可理解性和适用性。比如商业分析中的数据挖掘，其可用性仅 10% 左右，并非“一挖就灵”。2012 年，加拿大作家史蒂芬·马尔什在其文章《文学不是数据：反对数字人文》中也表示，将文学当做数据会失去文学本身丰富的意蕴。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数据研究有可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却无法给问题合理的解释，也无法给出有针对性的对策，限制了其应用范围。比如舆情分析、政策计算、情感计算的应用。

再次，数据分析的集群研究会消灭重要的个体特征，而个体反而是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焦点。

最后，人文社会科学大数据研究过分关注技术分析，可能忽视创新思维和思辨分析，不利于大师级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培养。

总之，随着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的快速增长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日益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数据研究必然会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领域，但不会替代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光明日报》（京）2014年7期第7.11页

借力网络新媒体传播哲学社会科学

王伟光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当前，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力网络新媒体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网络新媒体发展方兴未艾

当今时代，网络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思想观念；正在不断突破传统媒体的局限，方便信息交流，开阔人们视野，解放人类思维，增强创新能力。截至2012年底，全球网民数量约25亿。截至目前，我国网民已过6亿，手机网民5亿多，微博用户超过3亿。当下，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喜欢随时随地上网，从网络上接收、传递信息。上网成为人们学习工作娱乐的新方式，网络世界被称为与家庭、学校、社会等现实环境并列的“第四成长环境”，网络生活成为不少网民的“第二人生”。网络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蔚为壮观，正在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网络新媒体可以说是媒体中的“多面手”、“集大成者”。通过网络新媒体，人们既可以看报读书、浏览杂志、观看影视，又可以聊天、购物、进行社交活动等，可谓无所不包，“一网打尽”。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新媒体有诸多优势：一是实现了人类传播模式的整合。网络传播囊括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既可以“点对点”传播，也可以“点对面”传播，还可以“面对面”传播。二是传播形式多样，且在不断创新。文字、图形、声音、触感等多媒体效果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电子邮件、电子读物、论坛、视频、即时聊天工具、博客、微博、微信等传播方式层出不穷。三是信息存储海量、传播效率很高。存储技术、网络宽带特别是云计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海量的存储、更快的数据处理和高效的传播得以实现。四是实现了实时性与互动性。电子化的网络信息平台具有操作简单、编排方便、发布快速等特点，能够实时传播，并可以与受众即时互动。

哲学社会科学传播正向网络新媒体转移

不论在我国还是在海外，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大都以论文为主，这就决定了其发布形式是以期刊为主。此外，报纸的学术理论版、电视的文化学术类纪录片与专题片等，

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扩散平台。但是，在网络信息化大潮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发生了深刻变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动态表明，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传播已经向网络新媒体转移。当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网络化、数字化趋势非常明显。以数字出版为例，英国是欧洲国家中数字出版业最发达的国家，2012年出版业销售出口额达50亿英镑，其中纸质图书销售额较上年下降2%，而网络电子书销售额增长约50%。目前，英国99%的STM类（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期刊与95%的AHSS类（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期刊实现了在线获取。世界名刊《大英百科全书》尽管拥有雄厚的资源和200年的历史，享有行业领头者的声誉，但在面对仅售70美元在线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这一强势力量的冲击时，印刷版很快陷入了销售停滞。2009年4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止纸质版转为发行网络版；同年8月，曾经号称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宣布申请破产保护。2012年，德国《法兰克福论坛报》《德国金融时报》相继宣告破产、停刊。不仅如此，就连同为电子媒介的电视媒体也纷纷占领网络阵地。如英国老牌广播公司BBC早在1994年就进军网络。目前BBC网站已经发展成继电视、电台以外的第三个“频道”，是英国最热门的网站之一。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也在向网络新媒体转移。当前，互联网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思想交锋的主阵地，堪称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大变量”。首先要肯定，互联网平台释放了不少正能量，比如突发灾难中的守望相助、公益行动中的慷慨解囊、网络问政中的良性互动、微博反腐中的穷追不舍等。同时也必须正视网络空间中的各种乱象，如“水军”“推手”制造话题，黑客、病毒无孔不入，虚假信息泛滥成灾，各种违法行为屡禁不绝，越是反主流、反权威、反传统的声音越能赢得喝彩，而理性、正义、正面的声音则常常遭到排斥挤压，等等。这些由网络释放的负效应，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承受之“痛”。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传播向网络新媒体转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向网络新媒体转移的新形势，如果我们不抓紧应对，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话语权差距。其原因在于，一是互联网上中西信息量不对等。据统计，目前互联网上英文信息约占90%，中文信息不足1%，中文网络媒体在域名数量、网站信息量、用户活跃度等指标上均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况且，网络还有很强的“马太效应”，受众越多，点击量越大，其“粉丝”增长速度越快；而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有限的信息传播犹如一杯水倒入大海，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二是西方传媒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实力雄厚。西方传统媒体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至今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媒体运营、媒体操控、议题设置等经验。如今，西方传媒将其固有的语言优势、影响力优势、议程设置能力转移到网络上，通过网络推销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影响力不可小视。比如，2010年以来

发生在北非和西亚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就是西方国家利用现代通讯技术特别是网络社交媒体干涉别国内政、推广西方政治模式的典型事件。

积极适应新形势运用好网络新媒体

面对新形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国家有关部门要有“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政治意识和时代担当，积极适应新变革，善于运用新媒体，借力网络新媒体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切实转变观念，充分认识网络新媒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作用。当前，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没有完全认识网络新媒体的巨大能量和重要价值。有些专家学者还认为，互联网是草根媒体，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只有由报纸、杂志这些严肃媒体发表才合适，因此对利用网络新媒体发表成果并不积极。无疑，大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以“立言”作为价值取向的，但“立言”不是孤芳自赏，而是要有较多的“知音”和受众，从而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利用网络新媒体。有人形象地打过比方，在网络世界拥有 10 万粉丝，相当于一个新闻网站；拥有 100 万粉丝，相当于一份全国性报纸；拥有 1 亿粉丝，相当于一个国家级电视台。在这方面，倒是那些“大v”们捷足先登，抢占了不少话语权。当此之时，有志于“立言”者岂能将网络学术平台拱手相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有现代学者的敏感，要有阵地意识，努力占领网络学术媒体这块阵地，掌握网络学术话语权，为人民做学问，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从而使“立言”转化为“立德”“立功”。

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网络化事业的投入。运用新媒体传播哲学社会科学，仅仅依靠专家学者的力量是不够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网络化事业的投入，为运用新媒体传播哲学社会科学创造良好条件。一是加大对硬件的投入。例如，网络域名、网络服务器、视频宽带、网络安全、网络管理与维护都需要资金投入。二是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网络化的投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众多的专家学者，每年都会推出大量学术研究成果。要使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效益，前提是要让更多的人知晓。这就需要把这些学术研究成果数字化、网络化。应支持数字出版，开发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论文、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刊物等。三是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网站信息采集能力和原创内容建设的投入。新媒体传播需要与之相称的海量内容支撑，“内容为王”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共识。应加快哲学社会科学网站的采编队伍建设，培养一批知名的网络记者、编辑、评论员，加强网站的技术人才队伍和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家职能部门的支持下，已经建起中国社会科学网。该网以学术理论为特色，建立了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新型研究平台，实现图书资料数字化，有力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网络上的传播。我们还将继续增加投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新媒体传播能力建设，努力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人民日报》

让科研人员专心做研究 ——我国科研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科研环境是影响科技人员从事科研活动各种直接、间接因素的统称。良好的科研环境有利于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激发其创造活力，对于推动科技进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国科研环境基本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并得到了国家相关科技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在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查站点中选取了高等院校、研发机构、园区企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医疗卫生机构五类站点，面向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科研人员发放 8074 份问卷，回收 7868 份，有效问卷 7691 份，有效率为 97.8%。本文在此次调研的基础上，结合 2012 年各地科技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对我国科研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估。

科研人员对当前科研环境总体给予积极评价

一是科研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近三成科研人员感觉经费充足、任务饱满。

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科研经费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我国科研工作基础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科研人员工作任务普遍较为饱满，特别是留学人员、高学历人员、高职称人员等群体，对所在单位科研基础条件的认可度最高。

二是科研合作和专业化分工程度明显加强，科研人员总体认可团队合作规范。

调查结果显示，科研人员间的合作和专业化分工状况已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是，由研究生来帮助老师承担科研辅助工作的现象较为普遍，远高于使用专职辅助人员的比例，这显示出科研单位的团队合作规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是科研人员对所在单位科研管理能力给予积极评价，对职业发展空间持乐观态度。

调研显示，约九成科研人员对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的总体印象给予积极评价，其中有近六成的科研人员认为本单位科研辅助服务、整体创新氛围“总体上可以”或“非常好”，近七成的科研人员认为现行绩效评估机制合理。同时，大部分科研人员在工作上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从科研人员对过去两年里本单位科研人员流动的侧面观察情况来看，超过八成的科研人员没有感觉到其他科研人员的频繁流出，对在本单位的职业发展空间表示满意。

四是科技创新政策受到科研人员好评，执行和落实情况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励科技创新、吸引高层次人才和推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和配套措施，科研人员总体认可这些激励政策，其中近 40% 认为出台的政策很好，给予充分肯定；超过一半的科研人员仍然希望政府加大鼓励支持力度。

我国科研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大量机构缺乏系统高效的创新管理能力。

各类产学研机构普遍对科研工作的创造性活动规律认识不足，突出表现在科研组织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管理能力偏弱，惯于用行政管理和工程管理的的手段管理科研人员，对真正有价值的“创造性”工作配套支持不足，使得大批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消耗在低层次重复性的日常琐事中，出现了一方面科研人员频繁加班，另一方面七成左右科研人员直接从事科研活动的时间达不到一周 40 小时的状况。

二是科技经费投入和配置到人的针对性不强。

近年来，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快速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科技投入国家。这些大幅增加的科技经费在改善科研基础条件等“硬件设施”方面成效显著，但在投入到人特别是更具创新活力的中青年科研人员等方面存在不足。不同职称的科研人员对个体环境的认知具有显著差异，副高级和中级科研人员的科研实际工作时间强度、感觉科研工作具有挑战性的比例都高于正高级，但在科研活动条件、经费承担和开展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满意度都低于正高级，也显示出科技资源配置对这部分群体的支持不足。

三是多数科研人员仍然缺乏高层次和国际化的学术交流机会。

调研发现，中国科技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已经成为制约科研人员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44%的科研人员在学术交流上“主要是参加国内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或科技团体交流”，有三分之二的科研人员因为“国外会有一些语言或渠道障碍”而选择在国内发表科研成果，能够在国际上没有障碍地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科研人员比例不到 15%，只有 11%的人员可相对自由和方便地参加国外学术交流。四成以上的科研人员表示“较少进行学术交流”“缺乏相对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机会”，16%的科研人员即使是在国内发表科研成果也还存在着地域、机构或语言等方面的明显障碍，反映出部分科研人员参与学术交流的渠道不够畅通，学术交流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是科技资源配置机制的公共性和透明性不够。

对于本地区政府部门科研资助机制，除了 32%的科研人员没有给出明确判断外，明确选择“整个资助机制公开、透明”的人员比例不到 5%，而认为“过程非常不透明，各种潜规则非常严重”的比例竟高达 13%，30%的科研人员认为存在一些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地方，“但不是很严重”；另有接近 20%的人员认为总体上还不错，相较过去已经有很大改观。此外，还有一些科研人员在笔谈中专门提及科研经费分配中的“项目申请不公”问题，反映在项目指南制定、申请、评审中“学霸”现象盛行，希望相关科研项目设置和资助机制更加公开透明。

五是学术共同体和科技社团发挥作用不足。

学术共同体和科技社团是加强科研人员科学价值观和诚信教育、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调查表明，在科研人员对本地区科技社团的总体印象中，近三分之一科研人员表示平常很少和科技团体接触，一半以上认为本地区的科技团体不够活跃，近 8%表示对某个科技

社团有一些了解，仅有不到 3%的科研人员对社团情况比较了解、给出了“印象不错”的评价。可见，广大科研人员对科技社团的了解和参与程度明显不足，本应在发挥学术规范、塑造科学价值观、促进学术交流方面发挥重要载体和中介作用的科技社团目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学术共同体”自身建设、提升科研人员的价值认同是中国科学界当前发展的薄弱环节。

六是社会整体创新文化氛围不够理想。

良好的社会创新氛围是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和活力的重要前提，也是科研人员关注的重要方面。调研发现，科研人员对于创造性工作非常有必要的社会宽容失败、挑战学术权威、学术独立性等几个方面的氛围评价都不高。总体而言，多数科研人员认为与其他群体相比，社会地位提升幅度不大。

分析以上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科研人员创造力发挥不足、科研活动自主管理水平不高。

一是科技投入的大幅增加改善了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但不会自动带来科研人员对科研环境满意度的同等提升。

从调查情况来看，科研人员的层次越高，占据的科技资源越多，同时对科研环境的质量要求也更高。拥有留学经历、处于科研人员群体顶层的正高级科研人员，在科研基础条件、科研经费、成果发表和学术交流机会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他群体，在团队合作中也多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他们对团队合作规范非常重视，对所在单位科研管理水平的要求也更高。这一情况显示出创新管理和文化问题正在取代科技投入不足，成为制约我国当前科研环境改善的主要问题，要求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类科研机构探索更加符合科技创新活动规律的宏观和微观管理机制。

二是日益增长的科学自主性要求与行政化的科技管理体制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前我国科技宏观管理体制的主要矛盾之一。

外部过多行政力量的干预，使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科学共同体三个层面自主管理的程度不够，既降低了科研和管理工作的效率，同时也影响了作为知识型工作者的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成就感。特别是一些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缺乏对科研创新活动规律的重视，管理手段重计划、偏行政，对于创造性活动的管理能力与科研人员的实际需求差距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管理方式简单、科研人员重复劳动、大量工作劳而无功的现象出现。此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的公共参与机制不健全，导致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对公共科技事务的参与不足，科研人员对政府配置资源的公平和公正性认同度较低，也是影响科研人员对科研环境给予正面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尊重科研活动规律，推进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自主管理进程建议

改善科研环境，必须加强对科研活动及管理的规律性认识，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幅扩大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公众对政府科技事务的参与范围及话语权。课题组建议：

努力保障科研人员直接从事科研活动时间。

加大对公共科研机构稳定支持力度，简化科研管理和考核评价机制，缩减科研人员参与行政事务和其他社会事务活动时间；以“放水养鱼”的积极心态，支持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工作，引导一线科研人员逐步将直接从事科研活动的时间提升到正常工作时间的五分之三乃至五分之四以上。

开展不同类型科研机构综合配套体制改革试点。

积极探索新时期公共科研机构治理模式，选择部分科研水平较高的基础类和公益类科研院所开展综合配套体制改革试点。试点工作以理顺科研机构人、财、物、活动、综合管理等方面的运行机制为核心，建立人员一岗位一经费一活动一评估协调一致的科研管理体系；在充分调动科研人员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同时，增强各层级科研工作自主管理力度，激发科研人员创造力的充分发挥。

强化科学共同体在全社会科技事务中的话语权。

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学术规范和价值导引功能。逐步减少政府主导的各类科技评奖；加大专业学会、行业协会组织等各类专业团体和社会组织在院士评选、科技奖励与评价、抑制学术不端、创办学术期刊、科技新闻传播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在科研组织评估、项目评审、人才招聘等事务中加大同行评议的力度；放手由科学共同体重建学术规范和创新价值观。

建立更加透明和更高社会参与度的科技资源配置机制。

改革公共科技资源配置机制，通过网络技术和监督控制建设，提高科学家和社会公众在公共科技决策和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减少政府部门对科技项目组织和实施过程中的直接干预。加强社会监督管理机制建设，推进公共财政支持的各类科技项目研发成果、科技条件基础设施向全社会开放。

大幅增加支持科研人员“走出去”的经费预算。

实施科研人员“走出去”战略，快速提升科研人员研究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大幅增加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基金额度，在搭建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同时，加大对一线科研人员和中青年科研管理骨干学术出访的支持，派出人员规模连续三到四年保持 30%以上的增长率。

探索实施“普惠性”的科技政策，激励“大众创新”。

把鼓励、激发全社会创造力的充分迸发作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以创新主体的资质论高低，探索实施面向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普惠性”全员创新工程；继续推进国家四部委《关于加强创新方法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工作部署，不断在社会和各类企

事业单位推广和普及 TRIZ 等创造学方法论知识；增加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培训和高等教育中的创造力方法和科学美学教育内容，形成社会各主体多元、包容的大众创新文化氛围。

摘自：《光明日报》（京）2014 年 41 期

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迈克尔·威维尔卡

迈克尔·威维尔卡(Michel Wieviorka)，国际著名社会学家、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主席。曾任国际社会学协会(ISA)主席、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运动与社会干预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他于 2013 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汪建华整理，李培林审定）

社会科学发轫于西方，始于英、法、德，然后进入到美国，随后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陆续得到发展。但如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西方国家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上已失去其霸权地位。当下，我们需要从全球化的视角对社会科学进行再思考。

重建社会科学的“普遍价值”

全球化背景提出了两个反思的路径。第一是对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我们是不是在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太过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否应该重新思考西方社会科学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第二是对社会科学应用范围的反思，社会科学是不是应该具有更普遍的价值？

按照相对主义理论，中国、韩国、法国的思想是无法沟通的，比如中国的思想首先是被中国人所接受，其次才能被韩国人接受，最后有可能被法国人接受，因此，各国思想并不具有普遍价值。对此，我坚决反对。需要强调的是，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言，是非常抽象的，往往与现实相距甚远，并经常成为殖民、剥削等行为的工具。所以，现在尤其需思考的是，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如何重新对“普遍价值”进行一种再创造。

20 世纪 50-90 年代：从系统化转向碎片化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社会科学与今天有怎样的区别？以社会学为例，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社会学不但具有介入性、政治性、公共性，而且带有很强的批判性。当时的社会学家往往拥有非常系统化的理论和思考方式，能够以一种全面的视角来思考问题。比如，50 年代的社会学家帕森斯就非常热衷于建构庞大的社会理论体系，并进而以全面、系统的视角来思考社会学问题。帕森斯建构的这种宏大体系同时继承了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的思想传统和理论资源。当时的社会学家虽并不全是功能主义者，但大多能以较全面的视角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

那个年代社会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结构主义甚嚣尘上。虽然当时的社会学者比较多地介入公共生活，但是与此矛盾的是，占主流的结构主义认为“主体”是非常危险的。当时的研究往往致力于从结构上理解制度、体系等抽象事物，对行动者并没有多少兴趣。

70年代，社会学开始活跃，主要思潮也发生巨大转变。社会学者开始质疑功能主义这样的宏大体系，诚如舒马赫所言，“小的就是好的”。学者们开始关注非常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功能主义完全失去势头，对于帕森斯的作品，学生们可能认真读上两三页都很困难。

而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学者们认为应该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随处可见社会科学研究碎片化的现象。有些学者很快理解了这一转变：古德纳在1970年的《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描述了功能主义是如何走向没落的；美国社会学家霍洛维茨在《社会学的解体》中批判了社会科学的碎片化和相对主义。

以“全球”、“个人”取代“系统”、“行动者”

90年代之后，社会科学经历了新的变化。如今的社会科学需要探讨两个相互对垒又彼此关联的问题，分别是全球化和个人主义。全球化是一种全面、广泛的问题；而个人主义则是具体、个性化的问题。经济的全球化弱化了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国家的功能发生改变，并使每个人都能在扩大的活动空间中做自己的事。全球化同时也弱化了社会团结的作用，弱化了群体集体行动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全球化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

个人主义究竟指什么？可以从两个层面探讨：第一，个人主义指的是维护个人的利益，这是最直接的一种看法，个人为了收入、工作，以及获得更好的教育或医疗来使自己能够更体面地活在这个世上。第二，个人主义指涉一种个人自我建构的忧虑。许多社会学家使用“主体性”来描述个人自我建构的能力。于是，一方面全球化越来越深入，而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趋势也日益明显。

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获得最大利益，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获得主体性。贫困、种族主义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等不公正、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体，就往往会转而产生另外一种倾向，如暴力种族主义。我们在面临全球化的同时对个体进行一些非常具体的思考。所以，现在就不应该仅限于从单一社会或民族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而应该把思考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空间，即全球化背景下。这就意味着之前所说的“行动者”和“体系”已经不成立，应由“个人”和“全球”视角所取代。这与社会学最初诞生的民族国家背景完全不同。

学者们常把自己关在各自所研究的领域内，而越来越难以参加更为广泛的问题的讨论。这种碎片化或者说专业化的学科现状，使得学者越来越不会以学者或研究者的身份去参加公共讨论。

放弃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用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总结了我们的任务：放弃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指的是我们研究的问题往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范围之

内。一旦放弃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就会发现，需要对所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比如关注的对象、研究的工具、借助的理论、使用的范式等。

打破传统学科分工格局突显全球视角

在社会科学依然由欧美主导时，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分工非常简单，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西方社会中的问题，人类学家则对远方的民族和部落更为迷恋。如今这样的分工格局在西方已被打破。原本人类学家所研究的那些远方国家、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变成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比如，法国的一位人类学学者研究的是巴黎的地铁以及卢森堡公园。所以，现在需要以另一种方式来提出研究问题。

警惕过度专业化

正如上文所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学者愿意建构宏大的体系，既可保持全面的思考，也能研究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而如今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这种雄心壮志相去甚远。举一个稍具讽刺性的例子。如今能够看到一些学者写出非常严谨的学术文章，这些文章会说，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某一个具体现象做出了87%的解释，我现在通过新的研究，收集到新数据，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92%的解释，也就是说我能够多给出5%的解释。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工作，但是难以让人满意。而且，这些做出5%进步的学者很愿意和那些对这个研究推进1%、2%的学者进行讨论。这些学者在统计量化方法上受过很好的训练，在学术上的交流也是全球性的，因为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研究这个问题的十几个、二十几个学者也有往来。但他可能永远不会和隔壁研究室的同事一起探讨问题。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越来越走向自闭，学者们常把自己关在各自所研究的领域内，而越来越难以参加更为广泛的问题讨论。对于这种过度的专业化，其背后的两个因素值得注意。首先是大学组织的问题。现代的大学体系会更加促进学科之间的细分，而不是跨学科的沟通与综合，全球各地的大学一般都会鼓励年轻学者去选择一个研究的方向或专业。其次，相应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在加速学科的细分。如果想在学术生涯中有所建树，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刊登一篇做出5%更多解释的文章，相比写出更为宏大、广泛的研究性著作来说，显然容易得多。这种碎片化或者说专业化的学科现状，使得学者越来越不会以学者或研究者的身份去参加公共讨论。

跨学科合作：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新趋势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对静态分析非常感兴趣，比如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如今情况发生了改变，社会科学非常需要跨学科的讨论，以便使其他学科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近些年来有很多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合作的案例，比如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认知科学的合作，虽然使用生物学方法解释社会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做法，但仍然有必要和生物学家进行合作。如果对交际或信息社会进行研究，与这些研究大脑、认知系统的学者进行交流会十分有意义。

全球化还能够促进社会科学家与其他一些自然科学的学者进行合作，比如在环境、水资源、大型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六七年前在美国新奥尔良发生了飓风灾害，并引发洪水。要理解这起自然灾害，就需要从两方面进行思考。一方面要思考这个飓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到达新奥尔良地区；同时要思考这个飓风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比如受灾后，白人、富人会比黑人、穷人得到的帮助更多。所以，要理解研究灾害和风险之类的问题，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者的合作。

个体主义的上升使社会学能够从个案的角度去对之前仅能从团体角度考虑的问题进行研究。比如，社会中的生与死的问题，研究者慢慢开始否认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普遍模式和规则。如一些医院会建立医疗伦理委员会，主要处理比较极端的情况。

社会科学如今已进入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中，这个大环境实际上是有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尽管当下与过去存在很多断裂，但我相信明天会比过去更美好。这就需要，第一，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永远对现状保持批判；第二，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议题，也就是说自己能够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做主。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